

第四章 诗钟、联语趣事多(一)



《张伯驹十五讲》
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(接上期)

张伯驹的词作天赋,在诗钟、联语等艺术形式中的表现,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,其出奇卓绝的才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,一是让你感叹张伯驹的博学,二是让你敬佩张伯驹超常的智慧,用一俗语说,“不服是不行的”,因为那实在不是常人凭勤奋和努力就能学来的。

诗钟圣手

要讲清楚张伯驹的诗钟才华,就要先讲清楚什么是诗钟,它有哪些要求和特点。这一清末民初很流行、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还很流行的诗词艺术现在已近乎绝迹。据说,近些年有些人提倡恢复,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,但这一传统文化的形式要恢复起来是并不容易的。

诗钟属于中国韵文的一种。中国的韵文,起源可上溯至远古,历数代而不衰,致有楚辞、汉赋、唐宋诗词、元曲之盛。清代中期出现了新韵文——诗钟,首先发源于闽,继而走向全国。北京“打诗钟”的出现,则是福建人林则徐他们老辈子道光年间在北京兴起的,清末民初在北平很流行,到抗日战争前达到顶峰。后来,在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中,这种活动很快消逝了。

诗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,从形式看,很像律诗中间的一联,故又叫“两句诗”,因多是七言,也叫十四字诗。诗钟的基本法式和要求主要有五点:一是遵守七律的格律,平仄要求严格,对仗要匀整;二是用词要凝练;三是重视立意,内容无意义或意境不高的诗钟,谓之“哑钟”,即敲之不响,唱之无味,诗钟以立意高远、富含哲理者为上;四是用典忌僻,即注意诗钟用典均衡,如果一句用典,一句不用典,则称之为“跛脚钟”,同时用典不要太生僻;五是要紧扣钟题,由于诗钟是限时限题,因此必须扣住钟题,对仗工整,切合题意,不能离题。

诗钟主要分为两大类,即合咏分咏体、嵌字体。

合咏体要求上下联体现同一事物,即合咏一物或一题,表现题意,但不犯题字。如咏“无欲品高”,则有“淡拂功名无媚骨,深居草野有芳魂”的

句子。

分咏体则要求上下联分咏出绝不相干的两件物事,各写各的主题,各有各的独立意境和概念,但又要求彼此配合、上下照应。但同样要求上下联要表现题意,但不犯题字。如分咏“笔”和“伞”,“举世文章劳我写,满身雨水替人淋”就很有趣味。

分咏体中又有“集句分咏”,集句中的两联都不属于创作,而是集古代诗人或词人的两句诗词,分咏两种毫不相干的物事,但又要符合诗钟的各种要求,实在是难度很高的。因此,可以说分咏体要难于合咏体,同时分咏体也是诗钟常用的一种形式。

另一大类则是嵌字体。即任意拈两个平仄不同的字,都限定嵌在两句中的第几字,组成一联,嵌入七言联中的第几字,就称为“几唱”。

“打诗钟”的过程也很有趣,即每人事先在一张纸条上随便写上一字,然后将纸条团起,杂放在一起,每人随意抓起两个,约定将此二字作为第几字嵌入七言联。同时,别置一铜盘,在铜盘之上悬一丝线,下系铜钱一枚。挨着丝线横置线香一根,点火,等香火烧到丝线时,线断钱落,掉在铜盘里发出响声,如同击钟。此时尚未完成的就算输,或是罚酒,或是请客,由众人议定。

由此可见,在极短的时间里,要把任意的两个字各嵌在上下联中的第几字,且做到各自独立,又有关联,又有意境,又要合律,是极难的。所以,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,张伯驹邀人“打诗钟”时,已改了方法。张伯驹有一篇文章《饭后诗钟分咏》,就记述了当时“打诗钟”的情形,他说:“岁乙未,余倡为饭后诗钟集,专为分咏诗钟,参与者有夏棣棠、陈紫纶、章行严、靳仲云、江公岩、诸季迟……每月一集,多在季迟及余家。每集五题至六题,每题作二联至三联。先七日示题,收稿汇印,聚饮评唱,亦时有趣致之作。”

这段话意思是说,要把“嵌字”或“分咏”的“字”和“物事”事先寄给参与的各人,然后匿名汇编在一起,待聚会时,逐一评论,分出等次,再公布诗钟作者,大家聚饮评唱,切磋诗艺,实在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活动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,中国正处于“文革”时期,文化界百花凋零,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贫乏,天津著名学人、词家寇梦碧、张牧石、陈机峰几位先生每每相聚于海河岸边,又玩起了“打诗钟”游戏,借诗钟遣闷,时间一久,竟然积下了千首诗钟。张伯驹见了,十分兴奋,他是“打诗钟”的行家,也和作了许多,其中“分咏”、“嵌字”各体都有。后来,寇梦碧、张牧石从他们所作的诗钟中选了数百首,附录了张伯驹和作的诗钟,汇编成一册,定名为《七二钟声》,油印后分送给了朋友。2008年春,笔者去天津拜访张牧石先生,先生复印一册赠我,我一直珍藏着。

现在就具体看一下张伯驹“打诗钟”的表现:

一次,他抓到“魂、象”“六唱”,他出语连成二联“萍末风来群象动,梦边秋入一魂凉”“风雷鼓荡精魂出,江海澄清气象开”。又如“唐、水”“二唱”：“高唐有梦曾为雨,洛水无波只剩尘。”“边、卢”“三唱”：“不容边叟嘲空腹,愿向卢生借枕头。”

张伯驹最喜欢作的是分咏体。他说,分咏体“以毫不相干两题上下分咏,有时妙语天成,较嵌字体尤饶意趣。余即最喜为分咏体而不喜嵌字体。”

的确,分咏体诗钟的作法比嵌字体难得多,也有趣得多。分咏体即是几个人各写毫不相干的一“人”一“物”,揉成纸团,随意抓取,每人在限定的时间里,将此“人”和“物”分别刻画出来,既不能明指

此“人”此“物”,又要前后搭配,合理连贯,组成一联。

张伯驹一次抓到“温飞卿”“蝙蝠”分咏,他很快成联“旖旎花间推领袖,模棱世上似衣冠”,前句即指花间词派领袖温庭筠,后句显然是蝙蝠,可以说是惟妙惟肖,又含有深刻的讽刺意义,令人拍案叫绝。

又一次抓到“不倒翁”“结婚”分咏,他又从容道来:“比貌疑为长乐老,同心好为后来人。”

张伯驹此语一出,众人皆大笑称绝。张伯驹还曾抓到“状元”和“聋子”的分咏,他很快成联“一朝选在君王侧,终岁不闻丝竹声”。令人称奇的是,这两句都是集白居易诗句,上联采自《长恨歌》,下联来自《琵琶行》,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敏捷的思维能力,是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的。由此看来,“打诗钟”虽是游戏,却是一种大智慧、大学问的展现,是各种知识、学识的积累和灵感的突发,于幽默中意味深长,给人以启迪,使人顿感轻松和宽容、善良和明智。



青年时期的张伯驹

虽然现在已很少有人“打诗钟”了,更不为大众普遍了解了,但我们仍然有责任去认识它、介绍它,甚至希望在诗人群体中逐步恢复,继承“诗钟”这种优秀、智慧的文化活动,充分发挥其娱乐、育人的功能。

我曾看到一篇文章《张伯驹诗钟》,作者是李人凤,他列举了大量的张伯驹诗钟作品,最后他说:“抄录张伯驹先生的上述诗钟作品后,令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三条感慨和体会。第一,先生的作品文字传神,形象迷人,所有之作,无不借着联的形式、诗的意境、谜的趣味,成分咏诗钟的特殊绝妙之品,可说是开辟了二十世纪诗钟世界的新纪元。爱国主义是什么?爱国主义是具体的。诗钟一式,虽为文字之一戏,但通过对先生作品的品味,无不增添我们对祖国文字文化的深厚热爱。有如此之所得,还小吗?第二,张先生的作品高古典雅。然而,此从何来?读书方饱学,可是时下与先生一样读书饱学者有谁人?有几人?爱我文化,不读我古人之书行吗?任何文化艺术形式,凡是世界第一的,当必须是本民族最优秀的。第三,先生作品,诙谐巧慧。缘何诙谐巧慧?大概是需要大视宇宙自然,宏观世事世人,有高尚的人生观吧。真诚、自然,做人十分必要……”

这段话未必十分全面、准确、精当,但可以看出李先生对张伯驹学问、人品的佩服,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酷爱。

(未完待续)